

黎鸣 / 著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

21 世纪中国人应当怎样变得聪明起来

“愚蠢”

 华龄出版社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

——21 世纪中国人应当怎样变得聪明起来

黎 鸣/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成志 阎 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21世纪中国人应当怎样
变得聪明起来/黎鸣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3.10

ISBN 7-80178-093-0

I. 中… II. 黎… III. 传统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5385 号

书 名: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

——21世纪中国人应当怎样变得聪明起来

著 者:黎 鸣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09)

印 刷: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版 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2.25

字 数:280 千字

定 价:25.80 元



序

自序

我近日将出版两部书，一部名曰《西方哲学死了》，另一部即本书《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也曾秉承德尔菲神谕教导人们说：“认识你自己！”

《西方哲学死了》一书是笔者从“知人”的角度对西方近现代哲学以及近现代西方人的人性的考察所得到的初步结论。《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一书则是笔者从“自知”和“认识你自己”的角度出发，对中国自古以来的人学和中国人的的人性的考察所得到的初步结论。

前一部书有可能会使一些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们感到不快，虽然西方一些哲学家自己也早就在说“西方哲学已经终结了”、“完结了”，但不同的是，这样的话今天竟然第一次由一位非西方人，而且还是由一位中国人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甚至还用了“死了！”这样极端的言辞，毕竟在情感上有了逆向的刺激；但我想，大多数西方学人由于他们在学术观点上自由的习惯性和宽容性，所以更多的表现仍会是见怪不怪，或许还乐于看看奇闻。

后一部书则让我有一点担心。在前，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已经惹起了不少中国同胞们的怒斥，今天，我更以“愚蠢”的“中国人”命名自己的著作，真还不知会引来怎样的大火烧身。但我又一想，经过了已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倾听逆耳之言的宽容的能力大概也增长了不少，加之，笔者自认为不同于柏杨先生，笔者并不是仅仅发一发情绪和感慨的文艺家，而是更多地倾向于说理，讲道理，更多地从中国的历史渊源、从最基本的人性的



原理出发来阐释自己提出的问题。

中国人“愚蠢”吗？作为中国人，也包括笔者本人往往是很难自己承认的。但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尤其在近现代的历史中，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结果却是无法与别人（尤其是西方人）相比的。贫穷、落后、虚弱，政治人格上遭人侮辱，经济财富上被人盘剥，文化学术上受人轻视……这一切，笔者认定，均深深植根于长期以来中国人自己的“愚蠢”。认识自己，旨在改善自己。认识自己过去和今天的愚蠢，恰恰在追求自己未来和明天的聪明。

笔者深切地希望，21 世纪将是中国人可能会愈来愈变得聪明起来的世纪。事实上，21 世纪已经显示出了某种中国人有可能平等地与西方人一道竞争聪明的重大的机遇。这个重大的机遇即：近代以来，一直在促使西方人变得比其他人类愈来愈聪明起来的西方哲学——聪明学，在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末已经死了。西方哲学死了，人类在新的世纪将呼吁全人类的具有全新的逻辑基础的新的诞生的诞生。这个新的人学的全新的根本的逻辑将会首先诞生在什么地方呢？笔者希望它首先诞生在中国，首先诞生在彻底认识到了自己过去之所以“愚蠢”（或长期以来难得聪明起来）的根本原因的中国人之中。正是为此，我斗胆为我的同胞写下了这部书。此外，本书是在拙著《问人性》的部分结论基础上，加上近几年的部分新著编撰而成，期在与另一部专著《西方哲学死了》形成内容上的对称互补。《西方哲学死了》一书旨在批判西方的文化传统，本书旨在批判中国的文化传统。批判中、西方的文化传统又旨在融合中、西方文化，旨在推进新世纪全人类文化的创新。

欢迎辩论、驳难，更希望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黎 鸣

2003年9月15日于北京



目

录

目 录

人学原理篇

- 1 文化 人性的外衣 (3)
- 2 人性本善与本恶 (6)
- 3 人性原恶与原欲——永恒的实在 (9)
- 4 中西古代圣哲与人类元精神 (16)
- 5 人性禁忌与文化需求 (20)
- 6 圣哲的精神原则与现代人类的精神症 (24)
- 7 元精神与三个世界性民族 (28)

追问历史篇

- 8 为什么中国人如“一盘散沙” (35)
- 9 为什么中国人难以合作 (40)
- 10 为什么中国人不能首先兴起近现代自然科学 (44)
- 11 为什么中国人的“中世纪”如此漫长 (50)
- 12 为什么中国人缺乏真信仰精神 (54)
- 13 为什么中国人缺乏真求知精神 (62)
- 14 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只靠复兴传统来振兴民族文化 (69)
- 15 为什么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缺乏文明进步的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琴声”中最弱的一根“弦”是什么 (74)
- 16 为什么中国文人难以承担现代知识分子的大任 (92)
- 17 为什么说中国文人“非常卑鄙” (98)
- 18 为什么中国人具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 (102)
- 19 为什么中国人孝而不忠 (109)
- 20 为什么中国人的祖国愈来愈庞大 (112)



21	为什么中国人的历史既悠久又连续	(118)
22	为什么中国人必须继续珍惜孝的精神传统	(124)
23	为什么中国文人最需要深刻的反省	(131)
24	为什么中国人讲“礼”而不讲“理”	(137)
25	为什么中国人重做人而不重做事	(143)
26	为什么中国人欺善怕恶	(149)
27	为什么现代中国儿童多不听话	(155)
28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	(161)

瞻望未来篇

29	中国人,告别过去	(199)
30	为什么说中国文化一定可以在 21 世纪兴起	(207)
31	为什么说西方文化在 21 世纪会逐渐走向低落	(221)
32	为什么说 21 世纪人类进入道德真空的时代	(237)
33	为什么说西方哲学已经死了	(256)
34	为什么说 20 世纪是西方哲学走向死亡的最后历程 ...	(264)
35	《巨变》人类向何方	(287)
36	从人学的观点呼唤人类的第三等级制	(293)

附 篇

37	天才黄金律	(307)
38	垂暮者的“童话” 青春者的精神“白面” ——也谈使年轻人愚昧的“金庸热”	(320)
39	问题片论	(327)
40	在垃圾文字的环境中成长 ——就少儿读物、少儿教育、人学和人性教育等问题答记者问 ...	(336)
41	“不合时宜”的演讲	(340)
	“思想狂徒”黎鸣(代跋)	赛妮亚(348)

人 学 原 理 篇



文化 人性的外衣

几年之前,文化曾经是一个相当热闹的话题。近来因为文人们纷纷下海,炒股票、炒房地产、炒外汇……总之,炒钞票,谈文化的兴头顿时凉下来不少,但不时还可以从报刊杂志上看到一些零星的文化感叹,而且文化的大课题,如东西方文化、中国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等等也变成了更多的小课题,如着装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性文化,甚至豆腐文化、麻将文化等。由此可见,“文化”框框之大,几乎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不仅不会有任何隔碍,而且装什么都能装出不少兴味来。中国文人的聪明才智,生花妙笔,实在是没得说。

各种各样的“文化”看得越多,心里反而越不踏实,通常有一句话:“什么都是,便什么都不是”,既然如此,能够说“文化”什么都不是么?不过我想“文化”还是应该是个什么东西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人们无论说到什么都会不期而然地想到“文化”呢?我冥思苦想,很久,总算想起了这么个结论:文化——人性的外衣。反正是一家之言,仅供读者参考,能引起大家的批评,更是我的愿望。

人要穿衣,而且还要量体裁衣,这一点我想大家都会承认,只要不是疯子。但人为什么要穿衣呢?恐怕说法就可能各有不同。天冷的地区,人们会说,因为冷,所以人要穿衣服。既然是因为冷,所以人才要穿衣服,为什么气候炎热的地区,人们还照样要穿衣服呢?这时候可能人们会换一个说法:因为害羞,所以人们不能不穿

由此可见,“文化”框框之大,几乎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不仅不会有任何隔碍,而且装什么都能装出不少兴味来。中国文人的聪明才智,生花妙笔,实在是没得说。



衣服不仅遮掩着人体,同时也遮掩着人类自觉到某种丑恶、罪愆的人性。遮掩身体主要在防备外部的伤害,遮掩自觉丑恶的人性则不仅有防范外部的意思,还同时有人类防范自我冒犯他人的自罪意识,正是这种自罪意识使人类感到“害羞”。

衣服。人们把害怕暴露生殖器以及其他性感的部位,如女人的乳房、臀部,叫做害羞。在有的国家和地区,如沙特阿拉伯,女人在外人面前全身掩蔽得完完全全,真做到了中国古人所谓“寸肉皆羞”的地步。除了怕冷、害羞,当然还可能会有其他的解释,诸如对宇宙辐射的防护,对人体表层水分挥发的调控,对外界有可能刺伤擦伤人体的物体或偶尔昆虫螫伤的防护,以及为了外在的美观等等。

总之,人之所以要穿衣服主要在于防备外部环境对人的伤害,固然害羞的原因还有另一层比较复杂的意义需要加以说明。

“害羞”一说已超出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进入了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已经使穿衣服的事情涉及到了人类文化的问题了。也即是说,穿衣服的事情不仅仅关系到人类自然的需求,而且还同时关系到文化的需求。衣服不仅遮掩着人体,同时也遮掩着人类自觉到某种丑恶、罪愆的人性。遮掩身体主要在防备外部的伤害,遮掩自觉丑恶的人性则不仅有防范外部的意思,还同时有人类防范自我冒犯他人的自罪意识,正是这种自罪意识使人类感到“害羞”。

引起人类自罪意识的首先是性禁忌,而其中又特别是乱伦禁忌,即对于父女、母子之间性行为、性意识的禁忌,这种禁忌更扩大到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之间,以及同宗、同族、同姓的男女之间。乱伦禁忌更演变成乱交禁忌,即对任意男女之间性行为、性意识的禁忌,并因此而创造出了人类的婚姻制度,一妻多夫、一夫多妻、一夫一妻等等。除了性禁忌可以引起人类的自罪意识,使人类感到有必要遮掩自己的生殖器和身体上性感部位之外,还有其他文化禁忌,如宗教禁忌、道德禁忌、法律禁忌、知识禁忌等可以引起人类其他方面的自罪意识,促使人们产生其他各方面遮掩的需求。正是这种种遮掩的需求构成了人类创造文化——人性的外衣的基本动力。

整理一下刚才的思路: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禁忌。由于禁忌引起人类的自罪意识。自罪意识的外在表现即人类的“害羞”行为,或人们害怕自己身上



的某种丑恶、罪愆毫无遮掩地裸露在他人面前而作出的种种行为上的努力。“害羞”的人体需要穿衣(虽然这本身即表现出了“文化”);“害羞”的人性同样需要穿衣。不同于人体的是,人性是个抽象的概念,因此,我们为人性的衣服也取一个相应抽象的名称,这个名称我们就叫它做“文化”。

从上述思路,我们可以抽象出一个推论:懂得害羞是人类创造文化的起点。反之是否也可以说,不知羞耻则是人类毁灭文化的开始呢?关于这一点,本文暂时搁下不论。

很有意思的是,“文化”这两个中国方块字本来也就含有文饰化裁之意。在古文字中,文通纹,化同花、华,全都有类似在表面进行修饰、美化的意思。英语的“文化”(Cultural)一词词根源自耕作、栽培、培养、教养。从植物的栽培到人的教养,这后一层也隐隐含有为人性披上“有教养”的外衣的意思。人“有教养”即是有文化。

人性的外衣即文化,作为一种定义,上面已经向读者明确地提出来。但读者显然会问,这个定义最多像“人要穿衣”那样相应地作出了“人性也要穿文化”的某种类比,但文化具体是什么,它为什么以及怎样成为人性的“外衣”?人性又是什么?人性的禁忌和自罪意识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产生?这些问题难道不应一一作出交待吗?

“害羞”的人体需要穿衣(虽然这本身即表现出了“文化”);“害羞”的人性同样需要穿衣。不同于人体的是,人性是个抽象的概念,因此,我们为人性的衣服也取一个相应抽象的名称,这个名称我们就叫它做“文化”。



人性本善与本恶

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或人性既非本善，亦非本恶。

人性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无论中外，自古以来的圣哲多只以善恶来加以辨别，并不曾更具体指称人性是什么。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通常是：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或人性既非本善，亦非本恶。

中国古代儒家圣人基本上是人性本善观点的代表者，其中尤以孟子的表达最为明确：“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① 孟子更具体定义善即仁义礼智四端，而“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② 孔子虽未明确说过人性本善或本恶，只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但孔子对善的最重要的解释：“仁”，却透出了人性本善的倾向：“克己复礼为仁”、“仁者人也”，而且更有“为仁由己”之说。正因此才有相传宋代王应麟《三字经》的总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大体说来，这四句是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孔孟儒学的人性论观点的。孔孟的这种人性论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

与中国古代圣人相反，西方古代哲人，尤其古代宗教先知是明确的人性本恶论观点的代表者。西方人喜欢称他们的文化源自“二希”的传统。所谓“二希”即指古希腊与古希伯来。

古希伯来人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宗教信仰传统。古希伯来人的

^①《孟子·告子上》。

^②《孟子·告子上》。



人学原理篇

宗教——犹太教以及犹太教的变种基督教,尤其后者,在近2000年的时期里,一直是西方人主要的精神支柱,西方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基督教教徒。基督教圣经和基督教神学中关于人性的观点普遍地为西方人所接受。这种观点即是明确的人性本恶的观点。众所周知,基督教主张原罪说,即是说任何人天生即是有罪的,他们的罪先天地来自其祖先——亚当与夏娃。他们偷食了智慧之果,懂得了男女羞耻之事。基督教原罪的观点在西方近代宗教改革的新教领袖——路德、加尔文那里更是获得了极端的发挥,他们索性明指,任何人生来即是恶人,只有笃信上帝,才可能获得灵魂的拯救。

古希腊人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哲学传统。古希腊哲人虽未有明确的人性本恶的观点,但苏格拉底定义的“善即知识”的观点却是贯穿古希腊哲学的传统观点。而“善即知识”的观点本身即已经具有人性本恶的倾向:既然知识不是与生俱来,所以人生来无知,无知即不善,不善即有恶的偏向。

以此看来,说西方人有人性本恶论的传统倾向,决不为过。

尽管在人性本善与本恶的观点上,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相反的传统偏向,但在关于人类有向善的必然性的认识上,或向善的乐观态度上,中国圣人与西方哲人和宗教先知却是一致的。只不过中国圣人主张道德修养,内求向善;古希腊哲人主张增长知识,古希伯来宗教先知主张信仰上帝,二者均属外求向善。

对于向善的必然性的肯定即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合理性的肯定,也即对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后的人类合理性的社会需求的肯定,在这点上中国圣人与西方哲人是一致的,但却有内求和外求的差异。而在这点上佛陀悲观弃世的涅槃的理想则走了与中国圣人和西方哲人都不同的道路。

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关于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观点上的传统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方文化长期以来极其不同的发展的命运。

我们通常都有这样的认识,阻碍一个人进步的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这个人自己。同样,阻碍一个文化发展的最大的敌人,往往也是这个文化自身。原因何在?即在于人们常常都缺乏对自身的正确

任何人生来即是恶人,只有笃信上帝,才可能获得灵魂的拯救。

既然知识不是与生俱来,所以人生来无知,无知即不善,不善即有恶的偏向。

阻碍一个人进步的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这个人自己。同样,阻碍一个文化发展的最大的敌人,往往也是这个文化自身。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恶毒」

自知者莫过于知己之人性，自胜者莫过于克服自己人性的弱点、抑制自己人性中潜在的恶念。

认识。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中的一句神谕：“认识你自己”，可以认为是一句天启式的格言。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哲人即以这一句格言作为自己终生的警醒剂。中国的古代圣人老子也曾讲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认识自己，最深刻的莫过于认识自己的人性。自知者莫过于知己之人性，自胜者莫过于克服自己人性的弱点、抑制自己人性中潜在的恶念。

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性上的差异远远小于他们在对各自人性的认识上的差异。中国古代圣人的人性本善论的基本倾向以及他们把善主要理解为克己、礼让（包括孝悌、忠恕）的观点大异于西方古代哲人和宗教先知的人性本恶论的基本倾向以及他们把善或者理解为知识，或者理解为信仰上帝的观点。

按照笔者的研究，西方古代哲人和宗教先知的关于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符合真实的人性的，因此，他们关于善的观点也是相应真实有效的。由于他们对于人性恶的界定不尽准确，笔者判定他们是“歪打正着”。因为是“正着”，所以他们的认识与西方文化的发展大致具有正相关。

相反，中国古代圣人的关于人性的认识基本上与真实的人性不相符，因此，他们关于善的观点也是相应虚假无效的。由于他们对于人性善的观点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空想，笔者判定他们是“自欺欺人”。他们的认识与中国文化的发展经常处于相互矛盾的关系之中，因而大致呈负相关。

然而，真实的人性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呢？



人性原恶与原欲

——永恒的实在

讨论人的属性,从现在关于人的知识的积累来看,至少应有下面三个层次。

其一,是人的自然关系属性,或曰人的生物的根本性。

其二,是人的社会关系属性,或曰人的社会属性,也即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

其三,是人的思维关系属性,或曰人的精神属性,也即人对自然、社会、他人、自身等等的认识的属性。

简言之,人性在本来不可分的意义上统合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层属性。三者本不可分而我们强以分,其旨不过在有利于理解人性。在如上面分作三层的基础上,我们再作善恶的判别,无论关于善的定义是如中国圣人所言在克己、礼让、孝悌、忠恕,还是在西方哲人所言在于知识或在于信仰上帝,我们都可以大体有如下的结论:

- 1.人性的第一层,生物性:偏于恶;
- 2.人性的第二层,社会性:善恶交错;
- 3.人性的第三层,精神性:偏于善。

对于上面的结论,我估计多数的读者是会给予赞同的。但人们肯定会问,上面的结论对于推论总的人性是善或者是恶有什么用处呢?全部三层来一个三一三十一,取算平均值,还不是善恶难辨!

对于这一个问题我有个办法。在我的一部尚未最后完工的著

人性在本来不可分的意义上统合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层属性。三者本不可分而我们强以分,其旨不过在有利于理解人性。



愈是出现得早的事物，它的惰性愈大，也即它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或能动性愈小，而且这种惰性与它出现至今的时间成正比。

结论是：人性的90%偏向恶；

人性的10%偏向善。

中国古代圣人带头在“认识你自己”的道路上走偏了，所以中国文化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始终处于某种自相矛盾的境地。

作：《人性的双螺旋》一书中，我提出了一条带有假设性的公理，即：愈是出现得早的事物，它的惰性愈大，也即它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或能动性愈小，而且这种惰性与它出现至今的时间成正比。

用这条公理来判断人的惰性，且用上面3个层次来分别判断，即有如下结论：

1.人的生物属性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原生质，也即生命的起源，距今至少20亿年；

2.人的社会生物属性出现的时间，最多可追溯到三叶虫的起源，距今大约5亿年；

3.人作为精神动物出现的时间，最多可追溯到智人的出现，或者索性把南方古猿也考虑进来，距今恐怕也只有不到200万年。

按照上面的数字我们可以大致算出三者所具惰性的比例：

生物惰性：社会惰性：精神惰性

$$=20 \times 10^8 : 5 \times 10^8 : 2 \times 10^6$$

$$=2 \times 10^3 : 5 \times 10^2 : 2。$$

如果以人性的总惰性为1，则其在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的惰性比例将可换算成下式：

生物惰性：社会惰性：精神惰性

$$=0.8:0.2:0。$$

以此来计算人性的善恶偏向的分配：

$$0.8(\text{恶})+0.2(0.5\text{恶}+0.5\text{善})+0(\text{善})$$

$$=0.9(\text{恶})+0.1(\text{善})。$$

结论是：人性的90%偏向恶；

人性的10%偏向善。

这便是对人性善恶倾向的总估计，正是因此，我们说西方古代哲人和宗教先知对人性善恶的判别是符合真实的人性的，而相反，中国古代圣人对人性善恶的判别是不符合真实的人性的，是虚假的。中国古代圣人带头在“认识你自己”的道路上走偏了，所以中国文化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始终处于某种自相矛盾的境地。

在中国古代甚至迄今，说人性本恶，或人生来自私，是决不受